

斯 大 林 著

# 論農村中的工作



斯 大 林 著

# 論農村中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的演說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369

論農村中的工作

---

著 者：斯 大 林  
譯 校 者：唯 眞  
出 版 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 行 者：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

1-30,000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唯 眞 譯 校

И. В. СТАЛИН

О РАБОТЕ В ДЕРЕВНЕ

---

本書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齋出版局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中文單行本排印的，其譯文係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俄文原版譯出。

## 論農村中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的演說

同志們！我認爲各位發言同志已把我黨農村工作狀況，工作缺點和工作優點，特別是把工作缺點，作了一個正確的敘述。可是，我總覺得他們還沒有把我們農村工作缺點方面的最主要點說出來，還沒有把這些缺點底根源揭露出來。而這一點却是我們所最應注意的。因此，就請讓我來發表我對於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意見，用布爾什維克所固有的全部爽直精神來發表我的意見。

去年，一九三二年間，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的主要缺點是什麼呢？主要缺點就是我們去年的糧食採辦工作遇到了比前年，即比一九三一年更大的困難。

決不可說這是由於收成不好，因爲去年收成不僅不比前年壞些，而且要比前年好

些。誰也不能否認，一九三二年糧食收穫總量是比一九三一年多些，一九三一年因為蘇聯東北五個基本區域發生過旱災的結果，糧食數量是大大減少了的。固然，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的收成，也因為庫班和特勒克以及烏克蘭幾個區域內氣候條件不好而受到了某些損失。可是，毫無疑義，去年所受的損失還沒有一九三一年因東北各區發生旱災所遭受的損失一半那樣多。所以，我國一九三二年份的糧食收成是要比一九三一年多些。雖然如此，但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糧食採辦工作方面還是遇到了比前年更大的困難。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我們的工作為什麼有這個缺點呢？這種矛盾現象究應怎樣來解釋呢？

（一）這首先是因為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沒有估計到農村中因宣佈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所形成的新環境。正因為他們沒有估計到這個新環境，所以他們也就沒有根據新環境來從新改變工作方式。在還沒有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在沒有國家所定價格與市場價格這兩種糧食價格並存時，農村中的環境是一回事。自從宣佈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起，農村中的環境就必定要急劇變更了，因為宣佈集體農莊貿易就是承認較高於國家所定價格的市場糧食價格為合法價格。這種情況當然也就使農民在

向國家交納糧食時表現着一種吝嗇態度。農民當時這樣盤算着：「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已宣佈實行了，市場價格已經合法化了，於是我把同等數量的糧食拿到市場上去賣，就能比交納給國家時得到較多的錢，所以我如果不是傻子，當然就要把糧食留一手，少交納一些給國家，多留一些來做集體農莊貿易，以便在出賣同等數量的糧食時可以多賺一些錢」。

這本來是最簡單而自然的邏輯！

可是不幸我們那些農村工作人員——至少是其中許多人——竟沒有懂得這個簡單而自然的事情。在這個新環境中，爲要不致破壞蘇維埃政權所定糧食採辦計劃，共產黨員本來應當在收穫開始時，即在一九三二年七月時，就竭力加緊和督促糧食採辦工作。這是客觀環境所要求的。而他們在事實上又是怎樣幹了呢？他們並沒有督促糧食採辦工作，反而督促集體農莊實行各種貯存，結果就使糧食交納者在履行其對國家所負義務時更加吝嗇起來。他們既沒有懂得新環境，於是他們就不來顧慮農民在交納糧食方面的吝嗇態度能障礙糧食採辦工作，反而來焦心農民會想不到要留下一些糧食，以便後來運到市場上去做集體農莊的貿易，焦心農民會不幸而把自己全部糧食統統交給國家倉庫。

換句話說：我們的農村共產黨員，至少是其中的多數人，只看見了集體農莊貿易底長處，只懂得，只領會了集體農莊貿易底長處，却完全沒有懂得，沒有領會集體農莊貿易底短處，——他們沒有懂得，如果他們這些共產黨員不是從收穫糧食最初幾天起就極力督促糧食採辦運動，那末集體農莊貿易底短處是會使國家大受其害的。

而且不僅集體農莊工作人員犯了這種錯誤。許多蘇維埃農場經理也犯了這種錯誤，他們竟犯罪式地把應該交納給國家的糧食留下來，却按較高價格賣給旁人。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其關於開展集體農莊貿易問題的著名決議中，是不是顧到了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所形成的這種新環境呢？是的，是顧到了的。在決議上直接說過：只有把糧食採辦計劃完全執行並把種子收齊以後，才可以開始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在決議上直接說過：只有把糧食採辦工作和收藏種子的工作結束以後，大約是到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的時候把這些條件都執行完結後，才可以開始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當時簡直是用它們的這個決議來警告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說：你們切不要因顧慮種種貯蓄和貯存而模糊自己的視線，你們切不要離開主要任務，而應當從糧食收穫最初幾天起就開展糧食採辦工作，並特別加緊這個工作，因為第

一個任務是完成糧食採辦計劃，第二個任務是貯藏種子，你們只有把這些條件執行完結後，才可以開始實行和發展集體農莊糧食貿易。

也許中央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是錯在沒有充分剴切強調這一點，沒有充分嚴厲預告我們農村工作人員關於集體農莊貿易所包含的危險。可是，它們毫無疑義是把這些危險情形預告了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而且預告得十分明白。老實說，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對於我們各地方工作人員——不僅是區工作人員，而且有某些省工作人員——所具有的列寧主義鍛鍊和明達性，未免估量得有點過分了。

也許本來是不應該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的吧？尤其是因為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不僅有其長處，而且還有一些短處，那末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也許是一個錯誤吧？

不，這並不是一個錯誤。無論那一個革命辦法，如果它實行得不正確，都是不能担保沒有某些短處的。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也是如此。集體農莊貿易，無論對於農村或城市，無論對於工人階級或農民，都是同樣需要而且有利的。正因為它是有利的，所以必須加以施行。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施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是根據什麼理由出發的呢？

首先，就是因為要擴大城鄉間商品流轉底基礎，改善供給工人們農產品和供給農民們城市製造品的事業。毫無疑義，單靠國營貿易和合作社貿易是做不到這一層的。除了這些商品流轉溝道而外，還要利用新的溝道，即集體農莊貿易。我們施行集體農莊貿易，也就造成了這些新的溝道。

其次，就是因為要經過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來給予集體農莊莊員一種附加收入的源泉，鞏固他們的經濟狀況。

最後，就是因為要靠施行集體農莊貿易來更加推動農民去改善集體農莊工作，改善播種和收穫方面的工作。

你們知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所持的這些理由，是由近來集體農莊生活中的具體事實所完全證實了的。集體農莊更加鞏固了，退出集體農莊的現象停止了，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意向加強了，集體農莊莊員力求按更嚴格選擇的原則來接受新莊員，——所有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類似的事實，都是顯然證明集體農莊貿易不僅沒有使集體農莊地位減弱，反而使集體農莊地位加強和鞏固起來了。

所以，我們農村工作方面的缺點，並不是由於施行了集體農莊貿易，而是因為我們的工作人員沒有始終正確實行集體農莊貿易，因為他們不善於顧到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所形成的新環境，不善於適應這個新環境來改造自己的隊伍。

(二) 我們農村工作方面的缺點所由發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而且不僅這些同志——沒有了解我們農村工作條件因集體農莊在基本穀物區內統治地位奠定而發生了變更的情形。在我國穀物區裏，集體農莊經濟形式已經成為統治形式，——這件事實是我們大家都感覺高興的。至於這個情況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我們在發展農業方面的關注和責任這一點，卻就不是大家都懂得的了。許多人認為：既然集體化在某區某省已達到百分之七八十左右，那就是說一切事情都已妥貼了，我們也就可以不必管事，而聽其自然，聽其自流，以為集體化自然會解決一切，自然會提高農業的。但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同志們。其實，集體農莊成為我國農業中統治形式的事實，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我們對於農業的關注；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共產黨員在提高農業方面的領導作用。在目前這時候，自流態度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危險，比任何時候都要嚴重些。在目前這時候，自流態度是能葬送一切的。

當個體農戶還在農村中佔主要地位時，黨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干預，尙能以個別的幫助辦法，個別的忠告或警告爲限。當時，個體農民只得各自關照自己的經濟，因爲這個經濟只是他個人的經濟，他不能把經營這個經濟的責任推諉到其他任何人身上；當時他除了自己而外，是再沒有什麼人可以依靠的。當時，個體農民如果不願意挨餓，不願意餓死，就得親自照料播種收穫以及其他一切耕作手續。而一經轉入集體經濟時，情形就根本改變了。集體農莊不是個體經濟。所以，集體農莊莊員現在這樣說：「集體農莊是我的，又不是我的；集體農莊是我的，但同時又是張三李四王五及其他集體農莊莊員的，集體農莊是大家公有的。」現在集體農莊莊員，昨天還是個體農民而今天已是集體農民的莊員，已經能把責任推諉到本集體農莊其他莊員身上了，已經能依靠其他莊員了，因爲他知道集體農莊是不會使他挨餓的。因此，集體農莊莊員所有的關注，也就比他過去經營個人經濟時少些了，因爲現在對於集體農莊經濟的關注和責任，是由全體莊員分担的。

從這裏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對於處理經濟所負責任的重心，已經由個別農民身上移到集體農莊底領導機關，集體農莊底領導中堅身上來

了。現在，農民並不是要求自己，而是要集體農莊領導機關，或更確切一點說，與其說是要求自己，不如說是要求集體農莊領導機關來關注經濟和正確處理事務了。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黨現在已不能以對農業發展過程採取個別干預辦法爲限了。它現在應當親身担起集體農莊領導責任，應當親自担起對於工作的責任，並幫助集體農莊莊員根據科學技術成績來推進自己的經濟。

不僅如此。集體農莊是巨大經濟，而巨大經濟沒有計劃是不能經營的。包含有幾百個農戶，有時甚至包含有幾千個農戶的巨大農莊，是一定要按計劃指導才可經營的。它沒有計劃指導，就會破壞，就會瓦解。你們看，這就是集體農莊制度下的另一個新條件，這個條件是與經營個體細小經濟的條件根本不同的。可以把經營這種巨大農莊的事宜交給所謂事物自然行程，自流過程麼？當然是不可以的。爲要經營這種經濟，就須保證集體農莊某種最低限度數量的具有普通常識的人材，這些人材應能計劃經濟並有組織地經營經濟。很明顯的，除非由蘇維埃政權來經常干預集體農莊建設事業，除非由蘇維埃政權來經常幫助這一事業，便無法辦好這種經濟。

從這裏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集體農莊制度不僅沒有

減少，反而增加了黨和政府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關注與責任。從這裏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黨如果願意領導集體農莊運動，便應當熟悉集體農莊生活和集體農莊領導中的一切詳情。從這裏所應得出的結論，就是黨不應當減少，而應當增加它和集體農莊的聯系，應當知道集體農莊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以便能及時幫助集體農莊，並預防那些威脅着集體農莊的危險。

而我們在事實上所看見的情形又是怎樣呢？我們在事實上所看見的，是有一些區組織和省組織竟與集體農莊生活隔離，不知道集體農莊底需求。人們在辦公室內坐着，自滿自足地寫東寫西，殊不知集體農莊是在官僚主義辦公室外面發展着的。有時，他們竟與集體農莊完全隔離了，某些邊委委員竟不是從本邊疆內相當區組織方面，而是在莫斯科從中央委員方面得到關於本邊疆集體農莊內情形的消息。同志們，這是很痛心的，但這是事實。由個體經濟過渡到集體農莊，本應使共產黨員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加強起來。而在事實上這一過渡却往往使共產黨員專以集體化高度百分數自誇，以至於高枕而臥，漠不關心，聽其自流，聽其自然。必須對集體農莊經濟實行有計劃領導的問題，本應加強共產黨員在集體農莊裏的領導作用。而事實上呢，共產黨員却往往袖手旁觀，讓那些

從前的白衛軍官，從前的皮特柳爾分子以及一般工農敵人去把持集體農莊。

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缺點所由產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如此。

(三) 我們的農村工作方面缺點所由產生的第三個原因，就是我們許多同志過分估計了集體農莊這個新經濟形式底作用，結果竟把集體農莊看作偶像。他們認定：既然有了集體農莊這一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於是一切事情都已妥貼了，於是集體農莊事務底正確進行，集體農莊經濟底正確設計，集體農莊變為模範社會主義農莊等，都有保證了。他們沒有了解：集體農莊按其組織結構來說還很幼弱，而需要黨方面的重大幫助，需要黨給予它們一些堅定布爾什維克的幹部，需要黨對集體農莊事務實行日常的領導。但這還不能概括一切，甚至不是主要之點。這裏的主要缺點，就是我們許多同志過分估計了集體農莊這種新農業組織形式底力量和可能性。他們沒有了解：集體農莊雖然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可是它還遠遠沒有免除各種危險，還沒有免除各種反革命分子鑽進集體農莊領導機關裏來的危險，還沒有免除反蘇維埃分子在某種條件下爲了自己的目的來利用集體農莊的危險。

集體農莊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正如蘇維埃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形式一

樣。無論集體農莊和蘇維埃，都是我國革命底極大成果，工人階級底極大成果。但集體農莊和蘇維埃不過是個組織形式，固然是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但終究是個組織形式。一切都依這個形式包含有什麼內容爲轉移。

我們知道有工兵代表蘇維埃在一定時期內幫助反革命來反對過革命的事實。在我們蘇聯有過這樣的事實，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間，蘇維埃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領導的，所以蘇維埃當時掩護反革命來反對過革命。一九一八年末在德國也有過這樣的事實，蘇維埃當時是社會民主黨人所領導的，所以蘇維埃當時掩護反革命來反對過革命。所以，問題不僅在於蘇維埃這個組織形式，雖然這個形式是個極大的革命成果。問題首先就在於蘇維埃底工作內容，問題是在於蘇維埃底工作性質，問題是在於蘇維埃究竟是由誰所領導，——是由革命者所領導，抑是由反革命者所領導。正因為如此，所以反革命者並不是時時都表示反對蘇維埃的。例如大家知道，在喀琅施塔得暴動三時，俄國反革命魁首米留可夫曾經表示贊成蘇維埃，但不要共產黨人參加。「擁護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這就是俄國反革命魁首米留可夫當時所提出的口號。反革命者懂得：問題不僅在於蘇維埃本身，而且首先是在於由誰領導蘇維埃。

集體農莊也是如此。集體農莊這個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如果是由真正的革命者，即布爾什維克，即共產黨員所領導的，那它就能顯出經濟建設奇蹟來。反之，集體農莊如果是由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皮特柳爾的軍官和其他白衛分子，從前的鄧尼金分子和高爾察克分子所把持的，那它在一定時期內就能變成各種反革命罪行底掩護物。同時還要注意到，集體農莊這個組織形式不僅沒有免除反蘇維埃分子鑽進來的危險，而且在第一個時期甚至使反革命分子有一種暫時加以利用的方便機會。當農民還在進行個體經濟時，他們是散居各處，彼此分立，因此反蘇維埃分子在農民中間的反革命陰謀還不能發生多大的效果。而在農民過渡到了集體農莊經濟以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裏農民已經有現成的羣衆組織形式，即集體農莊。因此，反蘇維埃分子鑽進集體農莊和進行反蘇維埃活動，也就能獲得比較大得多的效果了。反蘇維埃分子一定是顧到了這一切情形的。大家知道，例如在北高加索一帶，有一部分反革命分子自動設法建立一種類似集體農莊的組織，並利用這些組織作爲掩護他們祕密組織的合法護符。同時大家知道，反蘇維埃分子在他們還沒有被揭破，還沒有被擊潰的那些區域裏，樂意加入集體農莊，甚至於還讚美集體農莊，以便在集體農莊內建立反革命工作底巢穴。同時大家